



中共武汉党史

大事记

89

# 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

( 1919—1987 )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年10月

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

(1919—1987)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 编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 珞珈山)

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 X 1168毫米 1/32 14.75 印张 378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307—00583—2/D·79

定价：5.95元

## 出版说明

一、《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共党史分期法，采用编年体例，依年记述而对跨年度的某些事件又相对集中的方法加以编纂。

二、立准、立好党史资料，是大事记的基础。本书主要依据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历史报刊资料，同时采用了口碑资料。在使用资料时，进行了考证、核实、鉴别，力求达到时间、地点、人物、内容、数据准确可靠。

三、力求内容的完整性，反映出历史概貌，是大事记的目标。本书既记述党组织概况和党的自身建设，又记述党领导武汉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宣传、教育、科技等领域和群众工作、政治工作、统战工作、外事工作等方面的重大活动；既记述中央、省级党的领导层在武汉地区的重大活动，又着重记述武汉地区党、政、群团的重要活动；既记述领导的决策，又记述决策贯彻执行的情况，成败与得失；既摆清史实，又寓观点于史实之中；既记事，又系人；力求做到大事不漏，要事、新事不丢；纵横结合、经纬交织、点线面相联结、决策与实践相统一，给人以立体感和思想启迪。

四、注重反映地方特色，武汉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都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也

有许多举国瞩目，甚至举世瞩目的大事。我们在编写时，既把武汉党史放在全国党史这个全局中考查，体现全国党史的共性，又着重记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武汉地区的实践，反映武汉地方党史的个性。

五、本书对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年，作了比较充分的记述，力图反映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马克思主义同本国、本地区实际相结合而展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面貌，给人以时代感和现实感。

六、本书编纂虽然历经数载，但因我们水平所限，定会存在着疏漏、缺点和错误。我们竭诚欢迎各方不吝赐教，斧正。

编者

1989年10月

( 878 ) ..... ( 1927年7月—1937年7月 ) ..... ( 72 )

( 198 ) ..... ( 1976年10月— ) ..... ( 378 )

## 目 录

###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 1919年5月—1927年7月 ) ..... ( 1 )

### 土地革命时期

( 1927年7月—1937年7月 ) ..... ( 72 )

### 抗日战争时期

( 1937年7月—1945年8月 ) ..... ( 119 )

###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 1945年8月—1949年5月 ) ..... ( 162 )

###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 1949年5月—1956年12月 ) ..... ( 199 )

###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 1957年1月—1966年5月 ) ..... ( 258 )

### “文化大革命”时期

(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 ..... ( 320 )

###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 1976年10月— ) ..... ( 378 )

(一) 徘徊中前进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 ( 378 )

(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979年1月—1987年12月) ..... ( 391 )

中国革命史 (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

( 1 ) ..... (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

中国革命史 ( 1979年1月—1987年12月 )

( 2 ) ..... ( 1979年1月—1987年12月 )

中国革命史 (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

( 3 ) ..... (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

中国革命史 ( 1979年1月—1987年12月 )

( 4 ) ..... ( 1979年1月—1987年12月 )

中国革命史 (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

( 5 ) ..... (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

中国革命史 ( 1979年1月—1987年12月 )

( 6 ) ..... ( 1979年1月—1987年12月 )

中国革命史 (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

( 7 ) ..... (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

中国革命史 ( 1979年1月—1987年12月 )

( 8 ) ..... ( 1979年1月—1987年12月 )

##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

###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1919年5月—1927年7月)

1919年

5月4日，为反对“巴黎和会”擅自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交日本接管和北洋军阀的屈膝卖国，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6日，武汉报界详细报道了北京学生的斗争情况。当晚，恽代英起草了题为《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爱国传单，并和林育南连夜赶印600份。传单指出“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9日，武昌各校学生代表集会于中华大学，决定以武昌学生团的名义致电声援，公推恽代英为武昌学生团拟写宣言书，并选派林育南等分赴各大学进行联络，以采取一致行动。17日，武昌学生团扩充改名为武汉学生联合会，在中华大学召开成立大会。会后即派代表赴省署请愿，要求承认学生的爱国行动为合法，并请省署致电北京政府，力争山东和青岛主权。从18日起，武汉各校学生多次举行集会、游行、演讲等活动，以唤醒同胞，力救危亡；同时，“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宣言、口号在以商业城市著称的武汉逐渐成为学生、工人、商界等各界人民的一致行动。29日，为指导和推动群众性反帝运动的发



展，武汉学联创办的《学生周刊》出版，以通俗的白话文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31日，武汉学联决定自6月1日起实行总罢课，并发表《武汉学生罢课宣言》，代表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学生5969人，提出了对于外交问题的严正立场，要求北京政府拒签巴黎和约，罢斥国贼，予学生以爱国自由。

6月1日，湖北军警当局包围武昌各大中学及各讲演地点。爱国学生冲出军警设防，分赴各讲演地点讲演。军警疯狂镇压，捕去学生数十人，殴伤10余人，酿成“六一惨案”。惨案发生后，武汉各界愤怒异常，当晚武汉各校校长召开会议，决定赴省署抗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撤去各校门前军警。2日，武汉学联向省议会递交请愿书，抗议军警暴行，要求弹劾警务处长，通电全国揭露湖北督军王占元镇压学生的罪行。3日，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施洋提出援救学生案，呈请法庭提起公诉，要求惩办凶手，抚恤学生，恢复学生自由。7日，恽代英、施洋等发起武汉各界联合会，组织商界罢市，工界罢工。10日，汉口“市面罢市者从少数转为多数，军警已无法干涉”。随后武昌全城亦一律罢市。11日，武汉轮驳水手及火夫举行同盟罢工，上海、汉口间的航运“全然在杜绝状态”。12日，武汉各公司大小商轮工人相继罢工，“一律停止装运客货”，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席卷整个江城。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王占元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7月31日，汉口各铁号工匠数千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同盟罢工。随后，汉口各炭行店员、楚兴公司麻布局工人、汉口面粉厂工人、汉口成衣业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先后举行罢工。

8月，董必武从上海返回武汉。董必武是1919年2月到沪的，在沪期间他经过李汉俊的介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出发，研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各种新思潮的书刊，“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方法，与孙中山先

生的迥然不同”，开始重新考虑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同时五四运动在上海掀起的反帝巨澜也使他“益信中国革命必能成功”，并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新兴势力，即中国无产阶级的参与之上。返汉时他决定以办报纸和办学校两种方式来鼓吹新思潮，唤醒民众。

9月，林育南等创办《向上》半月刊，探讨社会改造问题。

10月6日，李汉俊致函董必武，信中指出“湖北不只教育会糟，因为湖北全部糟，才容教育会糟。我们中国不只湖北糟，因为中国全部糟，才容湖北糟”，提出“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

10月20日，健学会在中华大学启智图书馆成立。主要成员有廖焕星、魏以新、林育南、陈学渭、唐际盛、李书渠等。健学会的宗旨为：“改造自身、改造环境”。会员以“实践、奋斗、互助、坚忍、俭朴”为信条。健学会是武汉出现的各种宣传新文化的进步社团之一。

10月27日，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王光祈和成员陈宝锬由京抵汉，介绍恽代英、余家菊、梁空（绍文）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12月，毛泽东率湖南驱张（敬尧）代表团赴京请愿，在武汉停留一个星期。毛泽东在汉口明德大学起草了《驱张宣言》，并秘密寄往全国。在汉期间，他与恽代英等畅谈改造社会等问题。

12月5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召开各校代表会议，抗议日本人制造“福州惨案”，声援福州人民的爱国斗争。

## 1920年

2月1日，由恽代英、林育南等发起，有李书渠、廖焕星、肖鸿举等11人参加的利群书社正式成立，租下武昌胡林翼路18号

开张营业。该社以互助社为核心，同时吸收了日新社、辅仁社、健学会等团体的大部分社员，最初是一个具有“工读互助团性质”的武汉各进步团体的结晶体，是一个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的雏形。它的主要活动是经售各种新书和进步报刊杂志，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共产党》、《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此外，书社的一些主要成员和中华大学、武昌高师的部分学生创办了《互助》、《我们的》等进步刊物，作为书社成员探讨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的园地。同年冬，恽代英等人在武昌大堤口创办利群毛巾厂，利群书社大多数成员在厂内半工半读，“实验新生活”。利群书社不但是传播新文化的场所，而且是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不但是新文化运动中湖北地区最大最有影响的一个社团，而且逐步成为长江中下游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利群书社的成立及其可贵探索，是武汉知识青年在五四运动后进一步觉醒的重要征兆。

同日，《少年世界》第1卷第2期发表了梁空的《武汉工厂调查》。文中列举了汉阳铁厂、武汉造币厂、粤汉铁路机器厂、京汉铁路机器厂等工厂工人的人数、工资状态、做工时间，并简介了汉阳铁厂历史上的两次罢工。这是武汉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后深入工厂，接触工人群众而产生的最早的调查报告之一。

2月4日至7日，陈独秀应武汉教育界邀请来汉讲学。先后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汉口堤下段保安会及小关帝庙、文华学校等处作了演说。他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说中，提出要改造当今的社会，必须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井田劳动工作；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应归为社会的共产。同时必须树立革命的精神，研究社会改造的方法，以免蹈辛亥革命的覆辙。在题为《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说中，提出教育要趋重社会，要注意启

发，要讲究实际应用，并强调工商业和交通发达的武汉“将来必为全国最重要之区”，提请武汉进步知识分子“必须特别注意”。陈独秀所宣传的思想理论，在武汉的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月，由董必武创办并担任实际负责人的私立武汉中学在武昌涵三宫正式建立。创办过程中，为便于立案，董必武等特意物色原在中华大学任教的刘觉民任校长，推湖北省议会议员、著名教育家郭肇明为董事长。开学后董必武、陈潭秋等一起团结所有进步教师，在办学中实行了一整套新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如男女生同班，国文课讲授白话文，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启发学生的革命思想，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促进学生注意国际国内的时事问题等。当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开始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后，他们更加“有意识地学习俄国革命，以武汉中学为据点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李汉俊、陈荫林、恽代英、刘子通、黄负生等均到该校任教或演讲。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武汉中学遂成为武汉地区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

春，恽代英离汉去京，接受少年中国学会委托，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4月4日，施洋、邱子嘉、李书渠、包惠僧、恽代英等数十人发起成立湖北平民教育社。在此前后，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钱介磐等发起组织了新教育社、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并出版了刊物《新教育》。他们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办起了劳工学校、武昌女子补习学校、识字班、平民学校，以工农群众及其子弟为主要对象，开展纯义务性的教育活动，进行文化教育和宣传进步思想。

4月14日，湖北各界联合会发表《对德俄外交意见书》，主张中国政府承认苏俄劳农政府，与德国恢复邦交。

5月18日，陈学渭等发起的、以“本互助精神，切实做人和研究适用的学术”为宗旨的武昌人社正式成立。

6月1日，《少年世界》第1卷第6期刊载了王崇植的《武汉工厂纪略》。作者虽自认为考察的主要问题是注意在机器上，但却在不多的文字中披露了工人劳动环境之恶劣，如“据云汉冶萍公司包括矿工、机匠等每天平均约有一人死于非命”；“财政局造纸厂‘面粉的氯气和破布里秽气及微生物，处处足以丧人性命’；湖北水泥厂‘满屋都是尘埃，呼吸了进去很有机会生肺病，工人的生命难免不短促’”。

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约他们在武汉进行建党活动。与此同时，刘伯垂途经上海被陈独秀吸收入党，并受其派遣回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刘伯垂返汉后分别与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商议，对建立武汉共产党组织，取得了一致意见。

秋，由刘伯垂主持，有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参加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会议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里召开。会上，刘伯垂报告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经过和组织情况；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讨论和学习了《共产党宣言》。通过讨论和学习，与会者明确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理想、主张和组织原则，决定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并规定了小组的工作纲领和组织生活制度，选举包惠僧为负责人。会议还决定租用武昌多公祠5号为机关部，门口挂刘芬（刘伯垂）律师事务所招牌，以作掩护。1921年初，包惠僧去上海，武汉党组织的工作由陈潭秋负责。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很快组织了以小组成员为主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组织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在知识青年中传播新思想，同时决定深入纱厂、铁路、码头，从社会调查入手，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

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登载了刘云生的《汉口苦力状况》和文华大学学生的《武昌五局工人的状况》。其中《汉口苦力状况》一文详细叙述了汉口码头搬运工人的来源、苦难生活状况及致死的各种原因,指出“汉口劳动界最苦者,莫若于驮货一类;人数既众,生活尤难,自生自灭,若异类之不如。彼等所受之苦痛,实人生之最难堪者”。

9月26日,由陈学渭、林育南等发起的,以改造社会,改造自身,强调为乡土服务(即乡村运动)为宗旨的诚社正式成立。

10月10日和15日,《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20号连续发表恽代英译文《英哲尔士论家庭起源》(即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关“家庭”的部分)和“译者志”,首次向中国人民推荐了恩格斯的这本著作。

11月7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在武汉中学召开。会议由包惠僧、董必武、陈潭秋、郑凯卿、赵子健、张国恩、刘伯垂、李书渠等发起,出席会议者共有18人。会上李书渠、董必武、包惠僧等先后讲话,指出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理论,实现自由和平等,消灭资本主义,在教育事业中显示首创精神,鼓励团员们向旧世界宣战,奔向光明和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会议确定团的名称为“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其宗旨为“研究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并规定了团的组织制度,推定包惠僧为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不久,汉口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1月14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9人。会上,刘伯垂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发言,介绍了阶级斗争的产生及剩余价值的理论,指出要不给资本家掠夺剩余价值的可能,必须组织总罢工,但由于罢工期间工人生活来源是重大的问题,因此我们这些“领导者”应当尽快地获得知识,研究社会主义和组织联合会的方法。董必武介绍了武汉工人的组织

状况和近期发生的一些罢工的情形及原因。

11月，国内思想界展开了关于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争论。陈独秀在批判张东荪改良主义的同时，在《新青年》第4号上撰文尖锐批评了恽代英在《互助》第1期上发表的《未来之梦》，指出其企图避免用革命手段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希望通过“共同生活的扩张”和在乡村发展教育、实业，从而由经济方面压服资产阶级，使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的思想，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这一批评使恽代英及利群书社其它成员的思想受到了震动，促使他们从空想中醒悟。

冬，李汉俊从上海回鄂省亲，在汉向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讲授唯物史观，介绍社会主义各流派，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 1921年

1月2日，由恽代英、黄负生等筹办的《武汉星期评论》创刊。该刊以“改造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它所刊载的许多文章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抨击湖北政治、教育、社会等诸问题上发挥了战斗作用。在黄负生等人加入武汉共产党组织后，该刊所载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色彩逐步增强。林育南、肖楚女、李汉俊、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夏之栩都曾为该刊撰稿。黄负生、李书渠、陈潭秋先后任编辑。

1月21日，《汉口新闻报》刊登《俄国少年共产会的组织法》，这是武汉报纸详细介绍苏俄革命团体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3月1日，该报又登载了《俄共产党之宣言》，其主要内容为：“竭全力以御外侮，借外债以兴实业，收土地林矿为国有，阻反

共产派之宣传，励行普及教育，保护劳农俄国”，宣传了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

1月，恽代英受陈独秀之托翻译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由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8种出版。该书不仅使利群书社的成员普遍懂得了要推翻黑暗统治，必须搞阶级斗争，而且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转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4月8日，包惠僧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我对于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文章提出通过劳工教育，劳动组合，成立劳工俱乐部等方式来提高工人的觉悟，号召广大工人“快快团结起来，推翻资本制度，实现人类福利。”

5月1日，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因车行决定每车每月赁金增加100文而举行同盟罢业。车行同意不加赁金后，工人复工。

6月，田诚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在汉口印行。这是早期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指出，共产主义是极合科学的能解放人类的唯一主义。要实现这个理想的社  
会，必须进行阶级斗争。第一步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第二步是要由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设劳农专政的国家。文章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抛弃教育万能等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树立起对主义的信仰，到工人农民中去，用阶级革命的手段去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7月16日至21日，恽代英、林育南等在黄冈回龙镇浚新小学召集利群书社及受其影响的各团体代表共24人开会，决定成立共存社。确定其宗旨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共存社的成立，是恽代英及其志同道合者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转折点。

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后移往浙江嘉兴）召开。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出席了会议，参与创建了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大会在听取了各地共产主



义小组代表的工作报告后，讨论了党的纲领与工作计划。董、陈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提出了党为反对共同敌人应该联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正确主张。董必武还和李汉俊为大会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如实总结了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对大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7月前后，武汉地区共产党组织选派了一批团员赴莫斯科学习。由于种种原因，团组织曾一度停止活动。

8月，董必武、陈潭秋由沪返汉后，即成立了党在武汉的临时机关——武汉工作委员会，陈潭秋主持工作。不久，发展黄负生、刘子通等入党。

10月12日，粤汉铁路武（昌）株（州）段机车处837名工人在武汉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下，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抗议外国总管开除工人而一致罢工。粤汉铁路机车处职工联合会代表全体职工向路局提出恢复被开除工人工作、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15项条件，工人们中断了从武昌到株州的全路运输，逼得北洋政府和吴佩孚不得不急电湖北督军肖耀南妥为办理。10月16日，北京总局代表和湖北督军代表一同到职工联合会调停，对工人们所提条件除少量的有待进一步磋商外，余均认可。职工联合会又向调停人提出不得开除罢工职工，不得扣留罢工期内工资等要求，也被一一接受，历时五天的罢工获得胜利。这次罢工迫使外国总管和北洋军阀政府让步，对武汉和全国的工人斗争特别是铁路工人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揭开了中国工运第一次高潮中武汉罢工潮的序幕。

10月，根据“一大”党纲中“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的规定，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在武昌成立。包惠僧任书记。机关设在武昌黄土坡下街27号。在此前后，发展李书渠、赵子俊入党。

10月，中共武汉地委根据“一大”后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关于